

延安觀察家評國內戰局

立即改組政府與統帥部，驅逐賣國賊、投降派與法西斯分子，挽救民族於危亡。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九月二十一日新華社電——

延安觀察家關於源內戰局發表評論稱：最近中國兩個戰場的軍事情勢，尖銳地揭破了國民黨當局所謂「軍令統一」的實質是什麼。在完全由國民黨統帥部所指揮的正關戰場，自本月二日湘敵進陷常德後之十二日間，先後失去湘桂邊境綏靖的祁陽、零陵、東安、新寧、道縣、資源、全縣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與側翼的邵陽，均已岌岌可危。同勢期中，廣東敵自西江與雷州半島兩路侵陷高要、四會、肇慶、開平、新會、廉江六綫。

目前自道縣南犯之敵，已直抵黔南最南端之江華、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敵，則已進抵廣西之懷集、信都。兩綫相照，已不滿一百二十哩。此種日喪一城之可恥失敗，即今日所謂「服從軍令」之代價。當盟國在海上竭力準備進攻菲律賓與中國海岸、在陸空竭力加強滇緬運輸與轟炸日寇佔領區及其本土之際，重慶腐敗無能的統帥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險與盟軍的困難，而給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陣地與拖延失敗的機會。蓋西南戰場失敗的嚴重性，首先尚不在喪師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戰略的結果。廣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蔽昆明甚至重慶之大門。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國空軍，亦因湘桂形勢的急速惡化而喪失了重要的陣地，且繼續感受國民黨劣軍事指揮的危害。退一步說，敵人即使僅僅打通其橫貫中國之交通綫，並將中國切為兩半，此對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勝計。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會上兩次演說，沒有一個字道及如何挽救當前的危機，或如何改變造成此危機之統帥部的方針與成分，徒然一再強調其阻礙抗戰勝利的所謂軍令統一。殊不知所謂軍令統一語，誠如參政員王雲五、胡霖兩氏所說，「原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只是用什麼軍令去統一。如必以今日失敗主義的軍令來

統一全國，則無非欲全國軍隊均向過去的河南戰事與現在的湘桂戰事看齊，同歸於盡，而後甘心。這種亡國心願，幫助敵人，阻礙勝利，引向失敗之外，不能有任何別的東面。

試一退觀被國民黨稱為「不服從軍令」的戰後戰場，則情形完全相反。這個戰場的人民軍隊，在八、九兩月中，連獲獲得重要勝利。山東的八路軍，在八月下半月與九月上半月中，連克五城，即黃河口的利津、樂陵、臨邑、膠東半島尖端的文章登和山東東南部的沂水，山東西南部的鄆城戰役，解放村鎮六百餘，山東東南濱海區的反「掃蕩」戰役，殲滅偽軍陳三坎一旅，並與正面戰場的日失一城成一極鮮明的對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許多勝利，如河北八路軍攻克北平城北十六哩的高麗營，攻克北平東南的青雲店與西南的長辛店，以及濟州、淮縣、深澤的縣城和易縣、徐水的城鎮，活動於南京、上海、寧波三角地帶的新四軍，攻克南京西南十六哩的六郎廟，長江北岸的石莊、張黃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長興及南京長興間的溧水、溧陽二城與寧波的甬郊，廣州附近的東江殘餘，亦攻入廣州市郊的龍眼潭。備戰沂水、文章、鄆城、長興

四次勝利統計，解放的國土即達一萬四千方里，或約一千五百方哩。由於敵後最近的連續勝利，中國解放區的人口總數已由八千六百萬增至九千萬以上。如果所謂軍令，是要抗日，要勝利，則敵後戰場實為執行抗戰軍令的模範。但是若國民黨所提議的必須將這種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將收復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獲的人槍送還敵軍五分之四，才叫做「服從軍令」，則這種所謂軍令也者不過是天皇陛下下的走狗們所發的販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軍令，中國人民將起而懲治這些實際上的賣國賊，決不許其繼續法外。

綜觀中國兩個戰場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戰場的中心問題是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人民團體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緊急國事會議，立即廢除國民黨的寡頭統治，徹底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立即將一切賣國賊，投降派，失敗主義者，專制主義與法西斯分子全部驅逐出去，並交付人民懲辦，由代表抗戰利益與人民意志的人們去掌握政令軍令，才能阻止敵人前進，挽救國家危亡。至於敵後戰場的中心問題則是加強武裝。在這裏，完全應該按照共產黨抗擊敵偽軍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勝仗，國民黨僅僅

抗擊敵偽軍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敗仗這種事實，共產黨應得盟國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國民黨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國民黨分配，因為它已無資格做這些事了。如果政府與統帥部不改組，則六分之一的物資交給國民黨亦應考慮，因為國民黨應負喪師失地與阻礙同盟國勝利之責，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給他，適以資敵。